

河北新文学大系

■ 小说卷

■ 短篇小说集

■ 王长华 崔志远 主编

出版传媒集团
北方出版社



河北新文学大系

■ 小说卷 ■ 短篇小说集 ■ 王长华 崔志远 主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北新文学大系. 短篇小说集 / 王长华, 崔志远主编 ;
马云选编.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34-9755-9

I. ①河… II. ①王… ②崔… ③马…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河北省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河北省③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④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8.22②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7169号

总 序

王长华 崔志远

河北新文学是指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展至今的百年河北文学。本书的具体时间是 1919—2005 年。相对于古代文学而言，新文学“新”在现代性。河北新文学如同中国新文学一样，伴随中国社会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完成了文学的现代化过渡。20 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及抗日战争、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新时期的历史变革……河北及中国新文学正是在这些历史的波涛中萌生、发展、凋落和繁荣。

一、河北新文学的萌生与发展

河北新文学萌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其精神导师和第一作家是李大钊。李大钊首先是一位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和传播者、五四新文化战士。他曾发表文学理论文章《什么是新文学》，散文《新纪元》、《五峰游记》，新诗《欢迎独秀出狱》、《山中即景》、《岭上的羊》等，他认为新文学应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应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什么是新文学》）。他的诗文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和启蒙性。这似乎为河北新文学的发展定下了基调。被鲁迅称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可说是河北新文学萌生期的丰碑，他先后加入浅草社

和沉钟社，1923年发表小说《蝉与晚祷》，1927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昨日的歌》，其中的著名篇目有《我是一条河》、《蚕马》、《蛇》等，1937年出版抒情诗般的散文集《山水》，《塞纳河畔的少女》、《一棵树》是其中的名篇。他的作品融古化欧，返朴归真，带有如梦似烟般的哀婉和幽秘的抒情气氛。多才的宋之的也创作了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和话剧《武则天》、《谁之罪》等。此期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还有裴文中、王亚平、张寒晖、公木、王林、田涛等。

总的看，小说和诗、文创作尚不成阵容，也缺乏影响全国的作品。倒是在戏剧方面，有几个影响全国的人和事件。一是南开新剧团。它成立于1914年，倡导人严范孙、张伯苓，团长时趾周、副团长张彭春。其实，南开新剧1909年便开始演出，第一部话剧是张伯苓编导的《用非所学》。1914—1920年，新剧团演出话剧33个，影响较大的是张彭春编导的《一念差》、《新村正》等。南开新剧团的活动长达四十余年，不仅为中国话剧进行了播种工作，而且培养出著名的戏剧人才张彭春、曹禺等。二是“定县农民戏剧实验”，这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下设的农村戏剧研究委员会进行的一项戏剧实验活动。主持者熊佛西，始于1932年。活动分三步：①“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职员业余演出，让农民接受话剧；②组织乡村业余剧团，辅导农民自己演出；③定县农民戏剧实验全国巡回演出，将实验推广到全国。惜乎七七事变发生，全国巡回演出未能成行。这一实验活动的意义在于对农民进行了话剧启蒙教育，并推出《过渡》、《牛》（均为熊佛西编剧）等优秀剧作。三是评剧的诞生。评剧1908—1928年产生于冀东，在民间说唱莲花落和民间歌舞“蹦蹦”的基础上，吸收京、梆大戏及各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而成。评剧的创始者是伟大的戏剧家成兆才，他创作改编剧本102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花为媒》和《杨三姐告状》。由于诞生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热潮中，评剧善演时装戏，有强烈的时代感；由于生长在民间，又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世俗性。

总之，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期，河北新文学完成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新文体的创建，而且带有强烈的启蒙性和时代感。

1937—1949年，河北同全国一样，进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斗争时期，战争焕发着燕赵儿女的“慷慨悲歌”精神，也使文学的发展

出现新的风貌。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察冀、晋冀鲁豫、冀察热辽边区根据地先后建立，为配合抗敌战争，边区不仅建立文协，还成立大量剧社、诗社和文化团体。就晋察冀边区看，其剧社分两个系列：部队剧社和地方剧社。部队剧社如抗敌、火线、战线、七月、冲锋、先进、前锋、前进、前哨、前卫、先锋、挺进、长城、尖兵、抗战等；地方剧社有来自延安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大文工团，也有地方组建的群众、新世纪剧社；还有数以千计的乡村剧团。其诗社有铁流社、战地社、文艺前卫社、新世纪诗社、晋察冀边区诗会、燕赵诗社等。这些剧社、诗社和文化团体对来自河北省内外的作家艺术家进行着全方位整合，在为战争服务的旗帜下，推动着河北新文学的巨大发展。在各类文学创作中，广泛普及和流传的是诗歌和戏剧。诗歌方面，街头诗运动是一道独特的景观。它由战地社和铁流社的诗人们联合发动，将通俗短小的抗战诗歌写在农村的墙壁上、大树上和大山的岩石上，或油印成传单散发，战地社的《战地》、《诗建设》和铁流社的《诗战线》也大量刊载街头诗。街头诗运动于1939年达到高潮，并发展持续至40年代。成就突出的诗人是田间、邵子南、史轮、力军、曼晴等。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坚壁》，曼晴的《写标语》等都影响一时。后来陆续出版的街头诗集有《粮食》（田间、邵子南、力军、石群），《战士万岁》（田间），《文化的民众》（邵子南），《晋察冀》（力军），《街头》（曼晴），《给自卫军》（赵景中、丹辉、魏巍），《力量》（邵子南、魏巍、方冰、沙漠）等。在河北解放区，田间无疑是诗坛领袖，他不仅是街头诗的发起者和主要诗人，还进行多种诗体的尝试。他写了大量小叙事诗，成就较高的是政治抒情诗和长篇叙事诗，前者如《给战斗者》、《祝山》，后者如《亲爱的土地》、《铁的子弟兵》、《赶车传》。《赶车传》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名作筑就他诗歌的辉煌。解放战争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叙事长诗，除田间的《赶车传》外，尚有严辰的《小沈庄》、艾青的《欢呼》、贺敬之的《笑》、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李冰的《赵巧儿》等。

戏剧方面，话剧、歌剧和传统戏曲通过部队、地方政府组织的各大剧社和众多乡村剧团得以广泛普及。“定县农民话剧实验”因抗战爆发而流产，抗战却又使得话剧在解放区的农村广泛传播。虽然战争年代更注重话

剧的战斗性和宣传作用，河北解放区话剧数量多而精品少，但像《子弟兵和老百姓》、《把眼光放远一点》（胡丹沸）、《粮食》（洛丁、张凡、朱星南）、《李国瑞》（杜烽）、《战斗里成长》（胡可）、《喜相逢》（胡可）、《红旗歌》（鲁煤、刘沧浪、辛大明）等或写英雄的成长，或写落后人物的转变，真切反映出战争年代里人们生活和心理的变化，也适当注意了艺术性，已成为那个时代“不可企及的范本”。一般认为，中国民族新歌剧成熟于陕北延安，其艺术资源是民间的秧歌剧，街头剧《兄妹开荒》等是早期成果，大型歌剧《白毛女》标志着民族新歌剧的成熟。殊不知，河北也盛行秧歌剧，丁里的《春耕快板剧》，邢野、陈强的《反“扫荡”》便早于《兄妹开荒》。《白毛女》的发祥地也在河北。西战团转战晋察冀时发现了白毛仙姑的故事，邵子南首先将其写成小说，又创作一千余行的叙事诗。李满天写成《白毛仙姑的故事》寄周扬，周扬指示创作歌剧向“七大”献礼，于是产生划时代的《白毛女》。其音乐也以河北民间音乐和戏曲为基本旋律，“小白菜”的曲调贯穿全剧，明显带有河北地方风味。《白毛女》无疑是体现河北地域特征的新歌剧。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与《白毛女》齐名的《王秀鸾》（傅铎编剧），不仅塑造了具有传统的伦理性与鲜明的现代感的王秀鸾的形象，艺术上也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特征。此期的优秀歌剧还有《不要杀他》（刘佳编剧）、《宝山参军》、《纺棉花》（均为王血波编剧）等。传统戏曲在战争年代里也通过“旧瓶装新酒”——新编历史剧——编演现代戏的方式焕发着新面貌。虽无称得上经典的剧作，却为新中国戏曲的改革提供了可贵经验。

小说创作，开始多为街头小说和小故事，1940年后逐渐走向成熟，出现了丁玲、孙犁、康濯、萧也牧、王林、秦兆阳、周而复、孔厥、袁静、邵子南、杨朔、管桦、马加、徐光耀、李英儒、梁斌等优秀作家，发表了长留史册的优秀作品。如孙犁的《荷花淀》、《邢兰》、《芦花荡》、《嘱咐》、《光荣》等短篇，风格清新明丽，富有诗情画意之美；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邵子南的《地雷阵》、管桦的《雨来没有死》等各有特色，都是短篇精品。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无疑是此期小说创作的高峰。前者描写张家口地区桑干河一带的土改生活，后者则写保定白洋淀一带人民的抗日斗争。丁玲、孔

厥、袁静是来自延安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后离开河北。然而，河北大地丰厚而复杂的生活土壤成就了他们的创作，留下了他们闪光的足迹，他们的创作和足迹也为河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滋养。散文方面，主要是通讯报告。值得一提的是大型通讯报告集《冀中一日》，它是冀中区1941年开展的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写作活动的成果。由王林、孙犁、李英儒定稿。选稿233篇，计35万字。分“魑魅魍魉”、“铁的子弟兵”、“民主、自由、幸福”、“战斗的人民”四辑。是冀中抗日军民斗争和生活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河北作家阵容空前壮大，或来自延安和大后方，或来自平津等地学校，或是本地土生土长，集结了全国的文学精英，如成仿吾、周扬、邓拓、沙科夫、萧三、丁玲、刘白羽、艾青、萧军、周立波、沙汀、田间、贺敬之、魏巍、孙犁、康濯、秦兆阳、杨朔、严辰、周而复、邵子南、钱丹辉、何洛、侯金镜、柳杞、王林、萧也牧、丁克辛、方纪、俞林、梁斌、路一、徐光耀、张志民、马加、刘石、李英儒、李满天、管桦、周巍峙、丁里、崔巍、汪洋、凌子风、钟惦棐、韩塞、刘萧无、杜烽、傅铎、刘家、胡可、胡朋、贾克、牧虹、张非、王莘、王血波、古元、高虹等。各种文体形式如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在广泛的普及中得以发展，并形成大众化风格；同时，也因对战争年代悲壮生活的真实表现而具有了崇高美。这一切，成为新中国河北文学的雏形。

二、河北新文学的成熟与挫折

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是河北新文学走向成熟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集结在河北的作家纷纷离开河北赴京、津和解放军部队，河北作家队伍锐减。但是，解放区的文学传统完好地保留下来，更何况，离开河北的作家们，不少人仍以其熟悉的河北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与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保持着密切联系（胡可便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子弟兵母亲戎冠秀为原型创作了大型话剧《槐树庄》），加之河北文艺界注意培养新生力量，不久便出现一批文学新人，如刘绍棠、刘流、魏连珍、任彦芳、苑继久、

盖祝国、李庆番、刘俊鹏、韩映山、常庚西、叶淘、长正、丁江、叶蓬、杜河、峭石、于雁军、宋文茂、吕原、郭澄清、浩然、钟铃、吴长城、王昌言、刘文彬、翟树雷、张峙、潮清等。这一切使河北当代文学有一个辉煌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文学题材强项是革命历史斗争和农村生活，体裁强项是戏剧和小说。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山地回忆》（孙犁）、《吴召儿》（孙犁）、《好大娘》（刘真）、《我和小荣》（刘真）等，中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孙犁）、《平原烈火》（徐光耀）、《苇塘记事》（杨沫）、《老桑树下的故事》（方纪）、《战斗在滹沱河上》（李英儒）等，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傅铎）、《游击队长》（邢野）、《为和平幸福而战》（杜烽）、《英雄的阵地》（胡可）等。描写农村新貌的作品，首推《新事新办》（谷峪）、《强扭的瓜不甜》（谷峪）、《亲家婆儿》（翟树雷）等。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占了大多数，短篇有《青枝绿叶》（刘绍棠）、《大青骡子》（刘绍棠）、《春种秋收》（康濯）、《水乡散记》（韩映山）、《喜鹊登枝》（浩然）等，中长篇有《铁木前传》（孙犁）、《水向东流》（李满天）、《沧石路畔》（张庆田）等，还有话剧《春暖花开》（胡丹沸）、《渠水长流花盛开》（王乃和）、《处处是春天》（王飞），评剧《山村女儿》（王昌言），武安落子《锁不住的人》（于雁军）等。这些草创时期的作品却不无精品，《铁木前传》至今脍炙人口，是因为作家以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揭示出超越时代的世事沧桑和人生真谛。《青枝绿叶》被叶圣陶选进高中语文课本，却是刘绍棠 16 岁的作品。

表现工人生活的作品虽薄弱，魏连珍的话剧《不是蝉》（1949 年 11 月）却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工人生活的话剧，也是新中国河北的第一部话剧。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稍后，有天津码头工人创作的话剧《六号门》。

1956 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河北文坛出现了新气象，一些作品大胆揭露现实生活的矛盾，如短篇《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田野落霞》（刘绍棠）以及中篇《水滴石穿》（康濯）等。但在反右中又往往因此而得咎。

此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是荷花淀文学流派的形成。这是以孙犁为首，在京、津、保一带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孙犁的一系列作品形成洋溢着自然美和人性美的俊逸风格，吸引了众多文学青年。他以《天津日报》的文

艺副刊为阵地，精心培养新人。不久便涌现出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优秀青年作者，刘绍棠的《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子》，从维熙的《夜过枣园》、《故乡散记》、《七月雨》，韩映山的《鸭子》、《作画》、《瓜园》，房树民的《一天夜里》、《花花轿子》等，颇得孙犁神韵。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围绕孙犁形成一个文学流派。其共同风格是讲究“美”和“情”，“美”者，即以理想精神和浪漫情怀弘扬生活中的真善美，竭力创造一种优美的境界；“情”者，即着意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伦理情趣，描绘人性美和人情美的闪光。冯健男概括为“诗情画意之美”。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名之为“荷花淀派”。不幸的是，反右中刘绍棠、从维熙被打成右派，孙犁停笔十年，房树民不再写小说，流派很快解体。对此流派，有人认为是“草色遥看近却无”，孙犁则认为“这个所谓流派，至少在目前尚未形成”。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河北文学创作出现了第一个高潮。首先应提及的是“红旗谱群落”的出现。它包括：梁斌的《红旗谱》、《播火记》，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英雄的乐章》，王林的《站起来的人们》，长正的《夜奔盘山》等。最为成功的是《红旗谱》，它通过朱、严两家三代的命运浓缩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从广阔的现实背景和纵深的历史背景上塑造朱老忠形象，使之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典型；艺术表现以传统手法为主，并吸收西方文学的营养，追求地方特色，采用农民口语，具有浑厚雄放的民族风格。这一切形成一种“红旗谱精神”。这种精神不仅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而且是古老的燕赵文化性格的传承。“红旗谱群落”是一种颇为奇特的文学现象：生于河北或曾经战斗在河北的作家，于20世纪50—60年代之交不约而同地描写河北的抗日战争和革命斗争，写出如此多的成功作品，于革命历史题材呈雄视全国之势。“红旗谱群落”的作家大都生在保定，影响所及，形成前仆后继的保定作家群。如果说梁斌、孙犁等算第一代，第二代则为韩映山、申跃中、周渺、赵新、崔砚君等，第三代为铁凝、陈冲、邢卓、郭湛芳、薛勇、韩冬、谈歌、阿宁、谷办华、石新茂等。三代作家形成的强大阵容，不仅影响着河北文坛，而且为

全国瞩目。

反映新生活的小说，有着较大的发展。其中，表现农村生活的小说仍占较大分量。可分两类，一类是表现新的生活风貌，如短篇《一盏抗旱灯下》（申跃中）、《社长的头发》（申跃中）、《尾台戏》（张峻）、《搭桥篇》（张峻）、《合婚台》（潮清）、《日常生活》（韩映山），长篇《东方红》（康濯）等。这类作品大多为青年作者之作，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情趣。但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康濯可谓比较成熟的作家，对“左”的思潮有着自觉的抵制，60年代初发表的《试论近年间的短篇小说》显示出理论家纠正“左”的思潮影响的胆识与见解。然而，他1963年出版的《东方红》明显带有强化阶级斗争的痕迹，尽管作家也不乏自己的艺术追求。另一类作品出现在60年代初文艺政策调整时期，对“左”的思潮显示出犀利的批判精神，如《“老坚决”外传》（张庆田）、《对手》（张庆田）、《力原》（李满天）等。其中，《“老坚决”外传》影响最大。不过，这些作品不久便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表现工业题材的作家虽然不多，但是万国儒于1958年崛起，到1964年便出版《风雪之夜》、《龙飞凤舞》、《欢乐的离别》三个短篇集。其中，《欢乐的离别》等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燕赵诗群的形成。战争年代的晋察冀便形成以田间为领袖的河北诗人群，田间以《赶车传》、《给战斗者》等名作筑就自己的辉煌，“时代的鼓手”成为诗人的共同追求。1957年田间重回河北，提出“开一代诗风”的号召，在南水泉召开民歌座谈会，在他主编的《蜜蜂》上出版民歌专集，并组织出版《河北新民歌》和《河北诗抄》。与老诗人远千里、曼晴等，悉心培养青年一代，不久便有一批青年诗人崭露头角，如何理、刘章、浪波、尧山壁、王洪涛、申身、戴砚田、任彦芳、韦野、旭宇、韩放等。此期出版的诗集主要有：田间的《赶车传》、《马头琴歌集》，刘章的《燕山集》、《五凤山之歌》、《葵花集》，何理的《唱一唱农村》、《喜报》，任彦芳的《帆》等。不过，除田间之外，大多数诗人的诗作尚未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这些青年诗人的黄金时代是新时期。因此可以说，以田间为首的燕赵诗群此期仅是初步形成。

那些新中国成立后离开河北的燕赵诗人，或以当年家乡的斗争题材进行创作，或带着燕赵文化个性进行创作，此期也获得丰收。如郭小川，创

作了叙事长诗《将军三部曲》、《一个和八个》、《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严厉的爱》与政治抒情诗《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青纱帐—甘蔗林》、《乡村大道》等。《将军三部曲》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优秀长诗之一，《一个和八个》在题材上有惊人的突破。在政治抒情诗领域创造的“新辞赋体”成为当代诗史上的重要收获。

这一时期的戏剧仍是发展强项。话剧出现了《槐树庄》（胡可）、《红旗谱》（河北省话剧院集体创作）、《战洪图》（鲁速）、《青松岭》（张仲朋）、《当家人》（刘泽明），歌剧出现了《园林好》（东娃、肖杰）等。这些剧作，尤其是《红旗谱》、《槐树庄》、《青松岭》等不仅在人民群众中有广泛影响，而且在我国当代戏剧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红旗谱》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在话剧民族化上有多种有益探索。《槐树庄》以建设时期的戎冠秀为模特，塑造了血肉丰满的村支书郭大娘的形象，是不可多得的新型农村妇女的典型。《青松岭》描写冀北山乡生活，张万山、钱广等形象塑造得生动鲜活，生活气息浓厚，在民间流传甚广。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有意强化的阶级斗争框架也削弱了生活的真实感。戏曲的改编和创作也佳作联袂，出现了河北梆子《宝莲灯》（王昌言编剧）、丝弦《空印盒》（毛达志改编）、老调《潘杨讼》（刘谷、方峥编剧）以及现代京剧《节振国》（唐山京剧团集体创作，于英执笔）、《八一风暴》（张家口京剧团集体创作）、《六号门》（天津京剧团集体创作）等。《宝莲灯》、《空印盒》、《潘杨讼》淋漓尽致地展示着河北地方剧种的优势和特色，也展示着燕赵传统的文化精神。《节振国》、《六号门》等显示着河北戏曲界锐意求新的精神。

总之，十七年的河北文坛，从作家队伍看，老作家精心引领，青年作家茁壮成长，加之天津划归河北，其蓬勃壮大之势，令人欣喜。从作品看，一是出现众多长篇巨制，包括长篇小说、大型戏剧、叙事和抒情长诗等，标志着河北省当代文学创作走向成熟；二是出现众多蜚声全国文坛的精品，《红旗谱》及众多的革命历史长篇、孙犁小说、郭小川和田间诗歌、话剧《槐树庄》和《青松岭》等，均在全国文坛一领风骚。从艺术形象看，塑造了至今传为口碑的典型，如朱老忠、严志和、张嘎、杨晓冬、张万山、钱广、三圣母、沉香等，在群众中已经生活了50余年。这一时期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反右、“大跃进”以及60年代的强化阶级斗争，影

响所及，一个很有前途的流派——荷花淀派销声匿迹了，一些作家被迫停止了创作；即使是很优秀的作品，也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对艺术来说甚至是致命性的。

三、河北新文学的辉煌与深化

新时期的河北文学进入新文学史的最佳时期，各种文体出现全面辉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发展高潮

新时期之初尤其是80年代以来，河北再度出现文学创作高潮。其表现为：

其一，荷花淀派的聚合与分化。新时期，孙犁重操创作之笔，进入辉煌的晚华期；刘绍棠、从维熙获得解放，进入创作的井喷期；韩映山进入新的丰收期。一些年轻的作家也在仿效孙犁：铁凝的《哦，香雪》颇得孙犁神韵，贾平凹的《满月儿》也迫近孙犁风格。铁凝、贾平凹被戏称为孙犁的“金童玉女”。1980年河北文学界对荷花淀派进行了认真研讨，保定文联又创办了《荷花淀》文学期刊，大有发展荷花淀流派之势。不久人们便发现，荷花淀派始聚即散。刘绍棠创作了《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蛾眉》、《黄花闺女池塘》、《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敬柳亭说书》等，构建起他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风格走向豪爽雄放，逐渐脱离荷花淀星系。从维熙创作出《火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泥泞》、《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鹿回头》系列及《走向混沌》等，构建起他的“大墙文学星系”，风格悲壮苍凉，早已与荷花淀风格大相径庭。早在《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之初，孙犁便致信从维熙，希望他再写生活的美。其结果是，不仅从维熙不能，而且孙犁创作的大量作品，如散文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陋巷集》、《老荒集》、《无为集》、《如云集》及小说集《芸斋小说》等，也由清新、优美变得睿智而深沉。铁凝于《哦，香雪》之后又创作了《六月的话题》、《晚钟》、《死刑》等众多短篇，《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麦秸垛》、《棉花垛》等中篇，《玫瑰门》等长篇，她的风格已由清纯、优美变为冷峻

和精警。荷花淀的分化并非坏事，实力雄厚的作家们走出荷花淀，开辟新的领域，构建自己的星系，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独树一帜，这恰是文学的繁荣。

其二，燕赵诗群的发展成熟。田间在晚华之年创作了具有探索意义的短诗集《清明》、《离宫及其他》等。50—60年代的青年诗人成为诗坛的中坚力量，其代表作如刘章的《北山恋》、叶蓬的《杜鹃声声》、浪波的《爱之河》、尧山壁的《我的北方》、王洪涛的《回太行》、戴砚田的《春的女儿》、旭宇的《醒来的歌声》、申身的《山高水长》、韦野的《故乡的月菊》等，何理的叙事长诗《天涯风雪》也是一部佳作。新一代也在迅速成长：张学梦以《现代化和我们自己》登上诗坛，刘小放的《我乡间的妻子》、《大地之子》，姚振函的《我和土地》、《感觉的平原》，萧振荣的《回乡纪事》，边国政的《对一座大山的询问》等是他们献给时代的佳作。其中不少诗作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北山恋》以对燕山的情真意切征服着读者，《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则“与时代的主旋律一起交响”，《回乡纪事》以新巧的构思发掘出平淡生活中的诗情画意，《我乡间的妻子》塑造了平凡而伟大的北方农村妇女形象，《对一座大山的询问》表现出面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庄严思考……诗人们在创作中寻找着自己的艺术个性，也有着共同的追求：执著地关注社会和人生，与时代生活血脉息息相通；以现实主义精神为主导，不断开阔艺术视野；以燕赵大地的风物山川建构诗歌的意象系统，并以浓郁的乡情进行心物交感。

其三，保定作家群的兴盛。红旗谱群落引领出一个保定作家群。80年代，第一代作家仍然不懈笔耕，面对迅速变革的时代，不断更新观念，进行新的探索。孙犁出版近十个散文集，成为我国新时期文坛屈指可数的散文家；梁斌、雪克、李英儒、路一、徐光耀等都创作了有分量的中长篇。第二代作家进入他们的成熟期。韩映山、申跃中、赵新、周渺、崔砚君等活跃在河北及全国文坛，写出自己的代表作。成就卓著的还是第三代作家。铁凝是最突出的一位，自《哦，香雪》之后，她创作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麦秸垛》、《玫瑰门》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有新发现，每一部作品都在文坛产生强烈的反响。她或写农村，或写城市，或写工厂，或写学校，或写家庭，或写社会，着意开掘的是“人类的

共同情感”，是“对生活和生命本身的总体把握与判断”。陈冲 80 年代几与铁凝比肩，他熟悉工厂和工人，熟悉变革的时代，专注于工业题材，他的《小厂来了个大学生》、《今年厂长二十六》、《会计今年四十七》、《无反馈快速跟踪》等以其新颖的构思、浓郁的科技意识和现代意识走红于 80 年代的文坛。在河北当代文学史上，他是继魏连珍、万国儒之后第三位写工业题材的成就卓著的作家，而且有很大的超越。铁凝和陈冲，是 80 年代河北文坛两颗最明亮的星。第三代作家的谈歌、邢卓、石新茂、薛勇、阿宁等都有优秀作品问世。

其四，“山庄文学”的兴起。“山庄文学”兴起在 80 年代初，在戏剧方面，孙德民是重镇，创作了话剧《懿贵妃》、《班禅东行》、《愿望》、《苍生》等剧作，还有周修的电视连续剧《人间芙蓉色》、苏金星的《东陵大盗》等；小说方面，有何申的“乡村干部系列”、郭秋良的长篇《康熙皇帝》等；散文方面，有郭秋良的《热河冷艳》，刘章、郭秋良的《虞美人》，刘芳的《黎雀声声》，杨林勃的《采花归来》等；诗歌方面，有何理的叙事长诗《天涯风雪》等。对于山庄文学和山庄戏剧，河北文论界和全国话剧界都曾进行讨论。常见的有两种界定：一种认为山庄文学是“以大避暑山庄文化为背景，以清代尤其是清代前期历史和大避暑山庄范畴的现代当代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文学现象”；一种认为山庄戏剧“一是反映避暑山庄、外八庙的清朝历史剧，一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燕北农村戏，还有就是以山庄为轴心，逐步辐射、扩散、超然上述题材选择，但终究不是其内在风格底蕴的戏”。笔者以为，山庄文学（包括山庄戏剧）是一种地域文化现象：承德地区文化属于燕赵子文化，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又体现着清代宗庙文化，或称京都文化。山庄文化实际是燕赵文化和京都文化的特殊结合。这才是山庄文学的深层文化本质。

其五，戏曲创作的丰收。首先应提到的是评剧作家赵德平。他 1982 年创作的评剧《嫁不出去的姑娘》是其成名作，之后又创作了《啼笑皆非》、《罪人》、《男妇女主任》、《大门里的媳妇》，90 年代创作的《水墙》使他进一步获得全国声誉。此外，河北梆子《哪吒》（方辰、王昌言、李冰）、《钟馗》（方辰），丝弦《瘸腿书记上山》（白良、马玉科），老调《忠烈千秋》（蔡晨、谢美生、叶中瑜），评剧《胡风汉月》等都是具有全国影

响的佳作。

（二）90年代以来的深化发展

如果说80年代初，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的确立，文学由政治中心回到它的文化本位，那么在90年代，文学则面对市场经济进行新的选择。危机和契机共存，失望与希望同在。可喜的是，90年代的河北作家在商品大潮之中顽强守卫着文学的圣土，河北文学于略显沉寂的表态中进行着发展和深化。80年代形成的区域作家群不断发展和壮大，各体裁领域向着长篇与精品进军。

其一，文坛领袖人物的出现。十七年间河北出现了孙犁、梁斌、田间三位文坛领袖，带起了荷花淀派、保定作家群、河北诗群，铸就了五六十年代河北文学的辉煌。90年代，铁凝继80年代的辉煌之后，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写出了短篇《孕妇和牛》、《砸骨头》、《马路动作》、《世界》、《树下》、《秀色》、《安德烈的晚上》、《省长日记》，中篇《永远有多远》、《埋人》、《对面》，长篇《无雨之城》、《大浴女》、《笨花》等，散文集《女人的白夜》等，还出版了集小说、散文、文论为一体的《铁凝文集》（五卷本）。她不断超越自己，超越文坛，创作达炉火纯青，成为蜚声中外的实力派作家。90年代以来，她先后当选为河北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这一切，使铁凝成为河北作家众望所归的领袖和旗帜。

孙德民是在市场大潮中带领剧团摸爬滚打出来的剧坛领袖人物。他1984年担任承德话剧团团长，在话剧事业出现全国性危机的情况下，承德话剧团居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孙德民根据剧团实际创作了众多优秀剧本。80年代的《懿贵妃》、《班禅东行》便引起全国戏剧界的关注，90年代又创作了话剧《女人》、《野百合》、《十三世纪达赖喇嘛》、《这里一片绿色》，加工修改了《班禅东行》并更名为《圣旅》，还写作电视剧《秋天的呼唤》、《班禅东行》等。他的“山庄戏剧”是“山庄文学”的焦点与核心，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切奠定了孙氏的河北剧坛领袖地位。

其二，“三驾马车”及其“新现实主义小说”。90年代中期，我国文坛现实主义创作再度兴盛，时称“现实主义冲击波”或“新现实主义”热

潮。被称为河北“三驾马车”的何申、谈歌、关仁山是其中坚力量。何申以写山乡的乡镇干部著称，创作了《村民组长》、《村长》、《年前年后》、《报道干事》、《信访办主任》、《多彩的乡村》等。乡镇干部是乡村社会的中枢神经，是方方面面的多种矛盾的交织点，把握了乡镇干部，也就把握了中国农村的现实进程。何申正是从这里奠定了自己的现实主义根基。谈歌以写工业改革名世，创作了《大厂》、《大厂续篇》、《年底》、《天下大事》、《危矿》、《城市》等；还创作了表现乡村历史文化的《野民岭》、《天下荒年》、《山问》、《家园笔记》等，简洁精短而文化味浓的笔记小说《绝死》、《绝琴》、《绝唱》、《绝饮》、《绝窑》等。《大厂》系列展示的主人公的风骨精神与《野民岭》系列和《绝死》系列地缘文化性格暗相沟通，见出谈歌小说现实性与历史感的深层融合。关仁山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表现冀东沿海农、渔民的生活与心理。他的作品分为“雪莲湾系列”和“大平原系列”，前者包括《苦雪》、《太极地》、《蓝脉》、《落魄天》、《闰年灯》、《风暴潮》等，后者有《九月还乡》、《大雪无乡》、《天壤》等。关仁山追求小说的历史感和悲剧性，这使他的作品带有了沉厚苍凉的审美特征。

“三驾马车”的出现并非偶然，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何申、谈歌、关仁山分别来自燕北承德、冀中保定和冀东唐山。保、承、唐三地活跃着河北最强大的作家群，“三驾马车”正是三大作家群哺育出的文学健儿。三地作家群的强大，又得益于其历史文化渊源。保定地处燕南，与赵接壤，不仅有久远的文化历史（送别荆轲的易水便在保定），而且有光荣的现代革命斗争史，是燕赵文化的核心地带，深受其影响的谈歌自觉地展示着这种精神。承德地处偏远的燕北，却是清代第二政治中心，古老的燕文化基底上深打上京都文化的印记。这种印记表现为强烈的政治性和时代责任感。何申对乡镇干部形象系列的塑造正可看出这一点。唐山的历史虽可追溯到秦始皇的“碣石门辞”，但更加辉煌的还是其近现代革命斗争史，给唐山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关仁山的许多作品着意探讨历史的阶级斗争、阶级关系同现实的经济关系的矛盾，形成复杂的两难判断，正是上述记忆的体现。

其三，散文创作的兴盛。在河北当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是较为薄弱的领域。80年代，散文创作的兴盛已见苗头。成立“河北散文学会”，出